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in China and Japan: Its Lexical Foundation

Guowei SHEN Jing ZHOU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rm *qimeng* (啟蒙) is closely related to *fameng* (發蒙) and *kaimeng* (開蒙), originally referring to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ldren gaining literacy. In modern usage, however, *qimeng* becam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estern term of “Enlightenment.” The process by which *qimeng* acquired this new meaning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conceptual history. Modern *qimeng* encompassed both intellectual content and its linguistic expression, the latter of which may be termed as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s of enlightenment.” James Legge’s *Graduated Reading* (1856) was the first text to introduce a wide range of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religi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knowledge to the East. However, it also revealed the inadequac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or articulating such knowledge—a challenge that Japan was also facing. Japan’s enlightenment books began with the *Shōgaku tokuhon* (Elementary Reader, 1873). As its accompaniment, a large number of *Jibiki* (a type of simplified glossaries) were printed for public use. The Reader played a major role in spreading new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the new prose style, while the Glossaries contribut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ducational vocabulary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compil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dictionaries. They shaped a lexicon of enlightenment that deeply influenced other East Asian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cess by which *qimeng* became the transla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offer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inguistic basis of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language contact; neologisms; reader; glossaries

Author: Guowei SHEN received his Ph.D. from Osaka University in 1993 with a dissertation titled *A Historical Study on Modern Lexical Exchange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He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Kansai University, Japan,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he lexical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modern times.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Hanyu Jindai Erzi de Yanjiu* [Research on Two-Character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in Modern Tim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and *Xinyu Wangfan* [Exchange of Neologisms: Languag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Modern Er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0).

Corresponding Author: Jing ZHOU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Philosophy and the Institute for Mutual Learning of East-West Civilization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hina. She holds a Ph.D. and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history of modern Sino-Japanese lexical exchange and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modern East Asia.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ten papers in academic journal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中日的近代啟蒙及其詞語基礎^①

沈國威 周菁

[摘要] 傳統詞語的“啟蒙”與“發蒙、開蒙”義近，謂幼童開始識字讀書；而現代詞語“啟蒙”是Enlightenment的譯詞。“啟蒙”成為譯詞的過程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近代啟蒙具有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與啟蒙內容相適應的語言形式，筆者稱之為“近代啟蒙的語言基礎”。傳教士理雅各 (J. Legge, 1815—1897) 所編譯的《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856) 第一次向東方介紹了19世紀西方社會的宗教、政治、經濟和生活習俗的方方面面，堪稱東方近代啟蒙第一書。但是閱讀該書可以發現，漢語於其時還沒有為新知識的敘述做好準備，這同時也是日本所面臨的問題。日本的近代啟蒙書始於《小學讀本》(1873)，當時為了配合《小學讀本》的使用，坊間出版了數量龐大的《字引》(即一種簡易詞彙集)。“讀本”在新知識與新文體的普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字引”則在學校教育用詞的普及、統一，以及日本國語詞典的編纂上做出了貢獻。日本的啟蒙詞彙對包括漢語在內的東亞其他語言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探討近代啟蒙的問題，除了人物、媒介(如報刊)、方式(如宣講、演說、戲劇)以外，克服語言障礙的過程也必須加以解明。本文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在廓清“啟蒙”如何成為譯詞的過程後，對中日的近代啟蒙書以及啟蒙賴以成立的詞語基礎的形成史做了初步考察。

[關鍵詞] 百科知識 語言接觸 新詞語 讀本 字引

[作者簡介] 沈國威，1993年2月以論文《近代日中語匯交流史》獲日本大阪大學博士學位。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現任浙江工商大學特聘教授。研究領域為近代詞彙史、中日近代詞彙交流史。近著有《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新語往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等。

周菁(通訊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東西文明互鑒研究院講師。博士。研究領域為近代中日詞彙交流史、近代概念史。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發表論文10餘篇。

① 基金項目：本文為202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漢語詞彙學的構建與理論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1&ZD310)的階段性成果。致謝：筆者衷心感謝匿名審稿人給予的極為專業性的批評建議，並據此對初稿的結構和內容做了較大的修改。其餘不足之處，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一、小引：聚焦語言

17至18世紀間在歐洲興起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以理性、科學和經驗為基礎，提倡個人自由、社會進步，質疑君主和教會的專制權威，反抗陳腐的傳統習俗，是一場深刻的思想文化運動，在政治、經濟、哲學、實證科學和文化等層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西方經過18世紀以降的啟蒙運動，新知識、新思想為一般民眾所掌握。啟蒙是時代轉型的必由之路，引導西方社會走出了中世紀，最終完成了由前近代向近代的過渡。

在啟蒙運動之前，歐洲還經歷了文藝復興（14至16世紀）和宗教改革（16世紀），此二者為啟蒙運動奠定了思想和社會基礎。而筆者作為語言研究者，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如何在語言層面為啟蒙運動做好準備這一問題尤為關切。所謂“語言上的準備”，具體表現在：

1. 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重新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翻譯並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科學和文學作品，從中汲取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思想。文藝復興為後世提供了古典哲學和科學的術語以及思維方式。
2. 宗教改革強調用民族語言翻譯《聖經》，推動了各民族語言的普及與國語化。宗教改革的宣傳和相關書籍為批判性語言和使用者的個性表達提供了範例。
3. 文藝復興期間印刷術取得了長足進步，宗教改革時期印刷術得以廣泛應用，文字媒體成為宣傳啟蒙思想的重要載體。
4. “每個人都有權閱讀《聖經》”這一宗教改革的理念，極大地促進了識字教育的發展，普通民眾的讀寫能力得到廣泛提升。

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後，在啟蒙運動中，民眾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啟蒙思想家們認為，知識是擺脫愚昧和迷信的關鍵，通過教育可以啟發人類理性，促進社會進步；通過接受教育可以實現個人的潛在能力，以達到社會平等這一人的基本權利。為全體國民，尤其是兒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會是國家的責任，只有通過普及教育，國家才能培養出有知識、有理性、公民意識強的國民。為此，在教育課程的設置上，需要用科學取代宗教，推動教育內容的世俗化。進入19世紀以後，國家主導的教育普及制度承擔起了民眾啟蒙的重任，啟蒙實現了由運動向制度的轉變。

回眸東亞，有史以來，由於頻繁的人員往來和書籍傳播，東亞形成了以漢籍為內核的東亞學問體系，即漢學。宋明以後理學成為學問的重要部分（在日本朱子學成為官學）。至清代，思想言論禁錮日嚴，社會發展停滯。來華傳教士理雅各指出，東方中國等國“其人耕田，頗識工藝，有法有書，惟於有用之藝（useful art），多所未達，而習俗亦有慘酷者”，處於半文明國（half-civilized nations）的狀態。^①日本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由“近世”走入“近代”，中國則將1919年的五四運動視為時代的轉捩點，滯後50年。

中國的近代轉型是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是西學東漸的必然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同樣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啟蒙的問題。故啟蒙一直是中國歷史、思想史、教育史等研究聚焦的重要課題，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研究成果。啟蒙作為一場改造社會的思想運動，學界對其中的各種問題都有著深入的討論，近期又有學者對啟蒙概念的發生、接受、普及等從概念史的視角展開了研究。^②東亞

① 理雅各編譯：《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856，四十葉上），理氏從貝克原著的半文明國名單中刪除了中國。參見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啟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2年。

② 陳建守：《如何啟蒙怎樣運動：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概念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08》，2023年。

在博物學、人文領域的知識積累上與西方不同，社會制度也大相徑庭，故啟蒙運動中必然存在著某些東亞特有的問題。首先，啟蒙的思想資源、知識體系均取自西方，跨語際翻譯也就成了最重要的路徑。這種翻譯與西方內部各語言之間的翻譯或日本的漢文訓讀完全不同，是東方藉助漢字漢文翻譯西方^①，其間概念上的誤解與失真也就不可避免。再者，由於東方自有東方的幼童識字和民眾教化的傳統，接受西方啟蒙的過程，同時也是對教育制度、內容加以改革的過程。

啟蒙具有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前者涉及整個知識體系，後者是對前者的內省和表述在語言層面的諸種面相。關於啟蒙的討論必然要涉及語言，語言本身沒有優劣之分，但需要為接受全新的知識體系做好準備，這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過程。當啟蒙的對象是廣大民眾，就需要有大眾能理解的語言；當孩童的識字和現代社會“常識”的獲得聯繫起來時，學校教育對語言的要求也隨之嚴格起來。與啟蒙內容相適應的語言形式，筆者稱之為“近代啟蒙的語言基礎”，啟蒙之路能走多遠，取決於語言的可能性。

關於啟蒙的語言基礎這一問題，迄今為止似乎關注並不多，然而這並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本文試圖以語言研究者的視角，對漢籍詞“啟蒙”的概念嬗變、中日近代啟蒙書的刊行、及其啟蒙詞語的形成、普及等問題加以探討。

二、語言接觸：當“啟蒙”成為enlighten的譯詞

“啟蒙”是中國古典詞，《辭源》（1915）的解釋是“啟蒙：啟發兒童之蒙昧也。朱子有《易學啟蒙》”^②。這裡有兩層意思，一為識字，二為（知識的）初級、入門階段。但不知何故，《漢語大詞典》（1986—1993）未收“啟蒙”，只收錄了“發蒙”“開蒙”。至《辭源》2015年版才能看到關於“啟蒙”的釋義：

“開導蒙昧，使之明白貫通……教導初學亦稱啟蒙”；“後來內容淺近示人門徑的書，多取啟蒙為名。如《隋書·經籍志》小學有晉顧愷之《啟蒙記》三卷，今不存。宋朱熹有《易學啟蒙》四卷。”^③

定位於古典閱讀工具書的《辭源》（2015）只給出了“啟蒙”的古典義，書證也僅限於圖書的名稱。對現代漢語中的“啟蒙”做出描述的是《現代漢語詞典》（以第7版，2016為例），其釋義如下：

1. 使初學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門的知識；
2. 普及新知識，使擺脫愚昧和迷信。^④

義項1是古典義的延續，但沒有提及“識字”；而義項2是後起的詞義，其發生受到了英語和日語的影響。下面我們來簡單地追溯這一過程。

1807年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 Morrison, 1782—1834），以東印度公司譯員的身份進入廣州，他編纂的英華雙語辭典是追求中外詞語對應的初步嘗試。但首次將“啟蒙”用作譯詞的是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ENLIGHTEN, to enlighten the ignorant, 啟蒙”。^⑤羅存德（W. Lobscheid, 1822—1893）在

① 日本的蘭學以漢文譯荷蘭語書籍，明治以後才逐漸過渡到和漢混淆文體。參見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新詞創造編”第1章，第62—66頁。

② 《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丑集77頁。

③ 《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24頁。

④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028頁。

⑤ 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I.*, Batavia: Parapattan, 1842, p. 501.

其《英華字典》（1866—1869）里襲用了麥都思的譯詞，“Enlighten, to enlighten the heart or mind, 照光心、開茅塞、啟蒙。”^①同時羅在Initiate; Initiating; Initiation; Instruct; Primary; Rudiment; School; Teach等詞條下也加入了“啟蒙”。^②羅的釋義總體上偏重於初學識字。其後，在麥都思和羅存德辭典的影響下（主要是後者），在enlighten的詞條下採用“啟蒙”作為譯詞的辭典有：《英華翠林韻府》（盧公明[J. Doolittle, 1824—1880], 1872）、《字典匯選集成》（黃少瓊, 1895）、*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馮鏡如, 1897, 同增補版1899）、《華英字典彙集》（譚達軒, 1897）^③、*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官話）（赫美玲[K. G. Hemeling, 1878—1925], 1916）等。而《達辭》（莫若廉, 1898）、《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謝洪賚, 1902）、《英華大辭典》（顏惠慶, 1908）的enlighten條下則沒有使用“啟蒙”。總而言之，對於enlighten (ment)，一部分英華辭典用“啟蒙”對譯，表示的是識字或受教育的意義，而另外一些則沒有使用“啟蒙”。與之相比，日本的《附音插圖英和字彙》（1873）、《附音插圖和譯英字彙》（1887）、《雙解英和大辭典》（1892）等主要英和辭典的enlighten (ment) 詞條下均沒有採用“啟蒙”，而是在釋義中使用了英華字典不存在的“開化”“（使）文明”。^④英和辭典的編纂者似乎認識到enlighten不僅僅是識字的問題。

陳建守在其研究中指出，日本學者大西祝最早將Aufklärung對譯為“啟蒙”，並在他的著作《西洋哲學史》中介紹了法國的啟蒙思潮。^⑤《西洋哲學史》是大西在東京專門學校（現早稻田大學）的講義錄^⑥，講授的時間在1894—1898年之間。1903—1904年刊行的《西洋哲學史》上卷正文471頁；下卷635頁，附錄譯名對照表26頁。該書第11章、45章、46章分別詳細介紹了希臘的啟蒙時代、法國的啟蒙思潮和德國的啟蒙思潮。全書“啟蒙”共出現63次，其中“啟蒙時代”19例（在譯名對照表中可見，啟蒙時代=Aufklärungsperiode）、“啟蒙的”42例、“啟蒙思潮”“啟蒙運動”各1例。“啟蒙的”是日語形容動詞的用法^⑦，在書中修飾“思潮、思想、潮流、潮勢、運動”等。大西的講授限於校內，對日本社會及一般公眾的影響應該是通過了其他管道。日本帝國教育會會刊《教育公報》第201號（1897年10月5日）上刊登了文學士大西祝的文章《啟蒙的思潮を論じて教育に及ぶ》（未完），這是大西祝在帝國教育會講談會上的講演（講演時間不詳）。數日之後，《國民之友》（第362號，1897年10月10日）又發表了署名“大西祝”

① 同上書, p. 735.

② 包括羅存德的《四書俚語啟蒙》（1860）在內，來華傳教士還將“啟蒙”用於入門書的名稱，如《數學啟蒙》（1853）、《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856）、《啟蒙詩歌》（1863）等。光緒初年，清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請總稅務司翻譯艾約瑟翻了一套譯介西方新學的啟蒙讀物：《西學略述》《格致總學啟蒙》《地志啟蒙》《地理質學啟蒙》《地學啟蒙》《格致質學啟蒙》《身理啟蒙》《動物學啟蒙》《化學啟蒙》《植物學啟蒙》《天文啟蒙》《辯學啟蒙》《希臘志略》《羅馬志略》《歐洲史略》。這套書於1886年由總稅務司署印行。甲午之後為了回應國人對西方知識的需求，1896年上海著易堂書局以《西學啟蒙十六種》為名結集刊行。這套書中包含紐約D. Appleton公司出版的Science Primers系列中的幾種，如赫胥黎的Introductory, 耶方斯的Logic等。本叢書在中日的翻譯情況及對東亞近代啟蒙的實際影響尚未有深入的討論。

③ 這幾種辭典在譯詞上都深受羅存德《英華字典》的影響，所以這也是可以預見到的結果。參見沈國威：〈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思想史》專號7，《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臺北：臺灣聯經出版社，2017年，第64—102頁。

④ 《附音插圖英和字彙》（1873）的漢字譯詞主要來自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但全書不見“啟蒙”；而《附音插圖和譯英字彙》（1887）、《雙解英和大辭典》（1892）在disabuse; edification; education; irradiate; luminary等詞條的譯詞使用了“啟蒙”。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1884）是羅氏字典的日文翻刻版，完全襲用了羅存德的譯詞，故在此不作討論。

⑤ 前揭陳建守：《如何啟蒙怎樣運動》，第58—62頁。

⑥ 大西祝（1864—1900），日本哲學家。1891年受聘與東京專門學校，講授與哲學有關的課程。西洋哲學史的講義錄經其學生整理，作為教材由該校出版部出版，初版刊行時間不詳，可以確認的只有1901年版。大西祝去世後東京警醒社書店於1903—1904作為《大西博士全集》第3卷出版。

⑦ 日語的“-的”是形容詞性詞綴，“啟蒙的”可譯成漢語“啟蒙性”，即具有啟蒙性質的。名詞作形容詞使用，只有該名詞所表示的事物性質成為該語言社會的百科知識時才有可能。參見沈國威：《科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章，第151—156頁。

的論文：《啓蒙時代の精神を論ず》。^①在這篇文章中大西對啓蒙時代的精神做了全面的論述。大西在文章指出：

“啓蒙時代”，德國的學者習慣使用Aufklärung，而英語正在尋找適當的譯詞。歐洲思想史上有過兩次偉大的啓蒙時期，一次是古代的希臘，另一次是18世紀的西歐。古希臘智者學派與蘇格拉底時期，已出現將學術研究的成果應用於人類社會實踐的傾向，主張以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文領域的課題；強調對政治經濟、倫理道德、宗教等現象進行科學探究。傳統信仰體系的日漸式微，催生了對“自然法則（physis）”與“人為規範（nomos）”的二元對立思考。自然法則被視為具有永恆的普遍性，人為規範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化。個體慾望的追求是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18世紀歐洲啓蒙思想的具體表現為：1.個體主義中心的傾向；2.拒絕一切不易理解的內容；3.用自然科學研究的視角觀察世間萬事；4.將科學的思想普及到整個社會。啓蒙運動在歐洲思想史中呈現為文明論/法理學/宗教觀的範式革新。法國大革命以此批判貴族特權與等級制度，18世紀法國啓蒙運動確立了“自然即真理，人定制度即謬誤”的認知範式。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啓蒙思潮與歐洲18世紀法國的啓蒙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將日本這一時代的特點用平易的語言表現出來就是那時膾炙人口的“文明開化”。

在文章結尾，大西針對日本啓蒙思潮的接受，憤懣地寫道：

彼時勃然興起的啓蒙思潮，其使命尚未及完成一半之時，某些社會精英便已汲汲於歷史回望了。他們將打破歷史枷鎖的努力視作洪水猛獸，更荒謬的是將泥古不化視作盡忠報國。此等妄念近來使我國教育界深陷固陋、頑迷、偏狹之窘境，可悲可嘆之至！當知此啓蒙思潮因未曾遭遇各方頑抗，政府反先於民眾引為主臬，故未演成法蘭西那般流血慘劇。此雖表面似國家之幸，然其思想流於過分溫吞，亦足令人扼腕。維新以降之啓蒙思潮，未能以更加徹底的革命精神奮勇突進，對此吾輩焉能不深為痛惜？^②

這篇文章開陳了大西對“啓蒙”的主要觀點，將“啓蒙主義還是國粹主義；漸進改革還是激進革命；政府主導還是民間自發”等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極為重要的問題呈現給日本社會。大西的功績在於，1.首次詳細介紹了西方啓蒙的歷史；2.通過自己的言行文章將啓蒙思想與教育聯繫到一起。正是在這之後，教育相關的書籍、辭典開始詳細介紹歐洲的啓蒙時代。1905年出版的《日本教育大辭書》以“啓蒙時代的教育”為題，詳述了啓蒙時代的意義、啓蒙時代的特徵，尤其對啓蒙運動在教育方面的若干重要事實，如虔誠主義的衰退、實用主義教育的發展、師範教育的出現、大學學術自由化的進展、博愛主義運動的興起等做出極為詳盡的闡述。同年刊行的《教育辭書》也將“啓蒙時代”列為詞條，對啓蒙時代教育制度的特點及對後世的影響做了說明。^③與此同時“啓蒙的、啓蒙家、啓蒙時代、啓蒙思想、啓蒙運動”等詞語的用例在報刊書籍集中出現，英和辭典上“Enlighten（ment）=啓蒙”對譯關係的確立也是在這一時間段。例如《新譯英和辭典》（1902）《新譯英和雙解辭典》（1908）《模範英和辭典》（1911）的enlighten（ment）的詞條下都出現了“啓蒙”。相比之下《國民百科辭典》（1909）的介紹則要簡單得多：“啓蒙：普及強調學術的世界觀、人生觀；注重人文的思想界的風潮。18世紀歐洲的思潮

① 大西祝：「〈啓蒙時代の精神を論ず〉」，收『大西博士全集』第6卷，東京：警覺社書店，1904年，第624—637頁。

② 大西祝：「〈啓蒙時代の精神を論ず〉」，第636—637頁。筆者譯。

③ 此前的教育類辭典，如《術語詳解—教育心理論》（1885）《教育學字彙》（1886）《教育辭典》（1893）完全沒有“啓蒙”的相關內容。

被稱為啟蒙時期。”^①而日本這一時期的大型國語辭典，如《言海》（1888—1891）、《日本大辭書》（1892—1894）、《帝國大辭典》（1896）、《日本新辭林》（1897）、《言葉之泉》（1899）、《辭林》（1910）對“啟蒙”的釋義基本上還是沿用漢語的古典義，對新詞義的記述要等到戰後。^②“啟蒙”在日語中的詞義更新通過英和辭典迅速傳遞到漢語，《新譯英漢辭典》（1908）、《新譯英漢雙解辭典》（1910）、《英華合璧辭匯》（1915；同增補版1925）全面採用了英和辭典里的“啟蒙”。^③1927年刊行的《綜合英漢大辭典》（商務印書館）將“啟蒙”作為哲學術語，直接與18世紀歐洲的思想運動接榫：

1. Enlighten, 【他動】啟迪，開導，啟發，教化；解疑，教；破（人）迷信。

2. Enlightenment, 【名】1光明，開發，啟發，教化；開化，文明，脫迷。2[哲]（十八世紀之）啟蒙，啟蒙運動。^④

另一方面，陳建守的研究表明，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綜合性工具書，如《新詞術語辭典》《百科辭典》等開始使用“啟蒙”介紹西方的啟蒙運動與啟蒙思想。^⑤而1930年刊行的《教育大辭書》在“啟蒙運動”的詞條下，對西方啟蒙運動的歷史、重要人物、思想淵源等從對教育影響的視角加以闡述。^⑥教育界對啟蒙運動的關注不亞於思想界，這一點與日本頗為相像。

在現代漢語中“啟蒙”作為圖書等名稱的一部分多位於詞組的後半部，如《國學啟蒙》《兒童繪畫啟蒙》等，意為“初步、入門”；在與“運動、思想、思潮、時代、-家”等連用時，是修飾成分（區別詞），意為“18世紀以降的思想改革”。這是現代漢語（甚至包括日語、韓語、越語）中“啟蒙”的基本意義和用法。從英華字典出發的“啟蒙”，經歷了英和辭典的歧變，添加了大寫的Enlightenment的新義，成為漢字文化圈的共同譯詞。

三、中國的近代啟蒙書

《現代漢語詞典》“啟蒙”的釋義中提到了兩種知識，即“基本的、入門的知識”和“新知識”。那麼前者指的是什麼，而使人擺脫愚昧和迷信的“新知識”指的又是什麼？舊時開蒙是指兒童開始識字，識字無法孤立進行，必然採取通俗易懂的文章（通常為韻文形式），也就是說開蒙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內容的問題。傳統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作為歷久不衰的開蒙課本，其中有中國歷史、倫理道德的說辭；《福惠全書》《婦女寶鑑》等各種善書也提供了傳統中國社會生活的基本知識。幼童由“三百千”入門，繼之以四書五經，登堂入室。識字是讀書的基本要求，在識字的基礎上進一步知理，文字代代相傳，理則有新舊之分。《現代漢語詞典》的“新知識”，指的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新理”，或那些被稱之為“（科學）常識”的內容，是全球性的百科知識。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一部分士大夫開眼看世界，魏源的《海國圖志》（1845）、徐繼畲的《瀛寰志略》（1847）、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1862）、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黃遵憲的《日本國志》（1895），以及郭嵩濤、王韜等的著述，引導國人認識海外形

① 《國民百科辭典》，東京：富山房，1908年，第509頁。根據該辭典編譯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911）沒有收錄“啟蒙”。

② 《日本國語大辭典》（1972—1976年第一版）收錄“啟蒙”“啟蒙思想”“啟蒙專制君主”“啟蒙專制主義”“啟蒙的”5個詞條。其中“啟蒙”給出的是《文明本節用集》（15世紀）的書證。

③ 但1908年刊行的《英華大辭典》情況比較特殊，該辭典從《新譯英和辭典》（1902）借用了大量譯詞，但對“啟蒙”基本上是固執舊有的詞義。“啟蒙”在該辭典中出現了16次，詞義都是開蒙、訓蒙。

④ 《綜合英漢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第389頁。

⑤ 前揭陳建守：《如何啟蒙怎樣運動》，第153—184頁。

⑥ 唐鉞、朱經農等主編：《教育大辭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941—942頁。

勢。但這些在“知己知彼”“師夷長技以制夷”名目下導入的知識，是嫁接在舊知識上的片段，並非“有組織、成體系”的新知^①，其讀者對象也僅限於士大夫階層。要完成知識的轉型，還需從教育體制的更新著手。

那麼，中國，乃至東亞以學童為對象的近代啟蒙始於何時？關於近代啟蒙的諸種因素：啟蒙者、被啟蒙者、制度、設施、內容，以及作為近代啟蒙之基礎的語言等都遇到了哪些問題？

1818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其宗旨之一是“讓恆河外各國用中文者，認識英文與及歐洲的文學和科學”^②。這無疑具有近代啟蒙的動機。在這樣的辦學宗旨引導下，教育內容自然與傳統的私塾有所不同。關於英華書院，現在看不到課程安排的詳細記載，只能通過所使用的教材做一些推測。馬禮遜夫人在《馬禮遜回憶錄》中說，英華書院曾編譯J. Joyce (1736—1816) 的*Scientific Dialogues*的部分內容，供兒童學習。^③*Scientific Dialogues*是19世紀初葉頗為流行的普及科學知識的入門書，共有七冊，內容如下：

第一冊Mechanics（力學），226頁

第二冊Astronomy（天文學），266頁

第三冊Hydrostatics（流體靜力學），260頁

第四冊Pneumatics（氣動學），270頁

第五冊Optics and magnetism（光學和磁學），284頁

第六冊Electricity and galvanism（電和電流），256頁

第七冊Companion（教輔材料），206頁

這套叢書的內容為力學、天文學、流體靜力學、氣動學、光學、電學等，但並不包括人文科學。本套叢書總篇幅超過1700頁，採用父女對話的形式展開，聽講者為女童這一點極具時代的象徵意義。馬禮遜所翻譯的內容沒有單獨出版，但如下所述，部分內容匯入了其他書籍。作為英華書院課本，有案可查的是馬禮遜和麥都思編寫的兩種地理摺頁冊，即《西遊地球聞見略傳》（1819）和《地理便童略傳》（1819）。二書的內容等分別如下：

《西遊地球聞見略傳》，馬禮遜著，32對開頁（以下記為“葉”），分以下的章節介紹宗教、地理、社會生活方面的知識。

1. 天文物原說 結合基督教教義，講解地球運轉，日食月食等天文知識，共4葉。

2. 地理地形西儒分州說 介紹四大陸以及各大陸主要國家等世界地理知識，再次講解月食原理，共5葉半。另外加插“地球圖說”2葉。

3. 歲時 介紹西方的歷法，月份日期等與中國的不同之處，講解有關“安息日”等基督教的知識，2葉。

4. 朝廷 介紹歐洲的國家體制。選舉。法律。陪審。議會等情況。尤其對美國詳加說明：“米利堅國無長君，係大臣輪流坐位，或四年或八年一會，並無王皇等稱，其國內大小各官，皆聽民舉”，1葉半。

5. 人事 介紹西方社會禮節，人民交往，男女平等等，1葉半。

6. 飲食 介紹西方的飲食習慣，僅4行。

① 西周：「知說二」，《明六雜誌》第17號，1874年。漢語譯文參見《或問》第44號，2023年12月，第185—186頁。

② 馬禮遜夫人編，鄧肇明譯：《馬禮遜回憶錄》，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261頁。原文的literature; science被譯為“文學”和“科學”，無論是原詞還是譯詞，都與今天的詞義有差別。參見沈國威：〈西學東漸與近代知識體系的展開〉，《當代外語研究》，2024年第2期，第5—23頁。

③ 《馬禮遜回憶錄》，第310頁。

7. 宮室 介紹西方的居住情況，僅3行。
8. 貧富 說貧富差別是不可避免的，但“良心的貧人，為天民，不必過慮”，體現了萬民平等的思想，僅4行。
9. 疾病死喪 介紹西方喪葬情況，鼓吹信教行善，1葉。
10. 夫婦 介紹西方婚姻制度，嫁娶風俗，尤其提到一夫一妻制，1葉。
11. 鬼神 介紹基督教信仰，1葉。

《地理便童略傳》，麥都思著，18葉，本書採用問答體，共設七十問，分為以下八回。^①

第一回 論地分四分

第二回 論中國

第三回 論印度彼耳西亞等國

第四回 論亞拉伯亞及如氏亞等國

第五回 論英吉利國

第六回 論友羅巴列國

第七回 論亞非利亞

第八回 論亞默利加

其中第五回的42—49問，解答了英國的地理位置、政治形態、人口、陪審制度、社會習俗、英語的語言文字、宗教、慈善機構等問題。二書儘管加入了一些新的內容，但是與《職方外紀》等17世紀耶穌會士撰寫的地理書並無實質性的區別。

另一種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啟蒙書是1826年英華書院出版的教材，該書封面上的信息如下：

The / English and Chinese / Student's Assistant, / Or /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c, / In English and Chinese: / The Chinese / By Shaou Tih, / A Native Chinese Student, / In the / Anglo-Chinese College, / Malacca. /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 1826. (/為改行)

本書沒有漢語書名，以下暫稱之為《英華學童便覽》。負責中文翻譯的Shaou Tih（小德）即袁德輝，他在19世紀20年代曾在澳門的天主教學校受業，後進入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學習，鴉片戰爭時期袁德輝是林則徐的主要譯員。《廣州番鬼錄》的作者亨特（W. C. Hunter, 1812—1891）稱小德為同學，他在《舊中國雜記》中寫道：我很快就發現他不是一個等閒之輩。他精通拉丁語，書院的中文老師和同學都為他在語言方面的造詣所折服。他來自四川省，大約25歲，能說流利的官話。因為他能寫一手好字，主要負責抄寫製作雕版的底樣，在書院的中文圖書出版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和他一起在英華書院的大約16個月裏，他的英語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書院的每一個人都稱他為“讀書人”。^②

《英華學童便覽》共102頁，如書影所示，橫排（但裝幀為豎排形式，所以頁次是從右到左），中英文對照，欄外有內容的提示。共有94個話題，從日常生活“書、書信、紙墨筆字、學堂、時刻光陰、人、人類”等開始，逐漸轉為人文歷史、地理，篇幅也大有增加。話題85以後的內容如下表所示：^③

① 本書版式等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相同。版心為「察世俗 一卷五」，但是，該雜誌第五卷，未收本書的內容。

② W.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1885, pp.260-261. 中譯本可參見[美]亨特：《廣州番鬼錄 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頁。譯文有調整。

③ 參見內田慶市：『文化交渉學と言語接觸：中國言語學における周縁からのアプローチ』第8章，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0年，第155—163頁。

表1 《英華學童便覽》話題例示

85	Celebrated men	名人	45—48頁
86	Geography	地理	48—55頁
87	Astronomy	天文	55—65頁
88	Chronology	史年紀	65—71頁
89	Theology	神道或神天之道理	71—77頁
90	Divine Revelation	神天所啟事之道	77—78頁
91	evidence	憑據	78—80頁
92	Prophecy	預言	80—81頁
93	Miracle	神蹟	81—85頁
94	Testimony	證	85—8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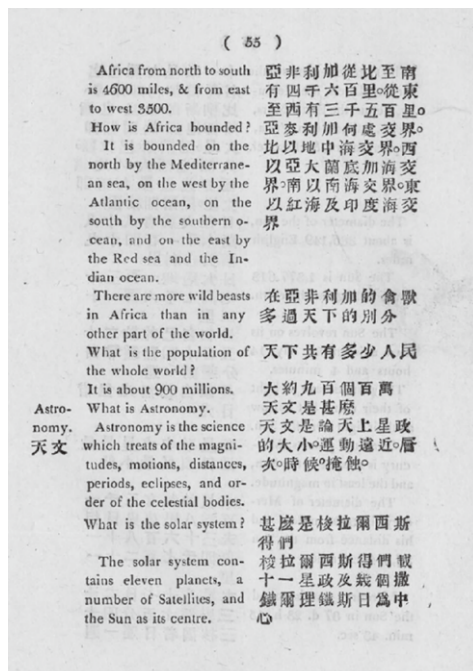


圖1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名人》一節介紹了亞當、諾亞、堯舜、朱熹等中外宗教歷史人物，除此以外還有英國的名人，如威靈頓公爵、培根、牛頓等。說培根是“開頭第一格物之人，說明教人如何推論自明致知之理的干系，從此稱他為格物致知之宗師”（47頁）；牛頓是“天下至大個性格物師。他是英吉利人，出世有一百八十三年”（48頁）。在《天文》一節介紹了太陽系、太陽系內的行星、彗星以及日食月食等。編者詳細給出了各個行星的直徑和到達太陽的距離，據此可以推測“天文”的內容應該有所本。調查的結果顯示，《英華學童便覽》里“天文”的內容，都可以在J. Joyce的 *Scientific Dialogues*，第二冊Astronomy（天文學）中找到出處。本書的編者在前言中寫道：

本書的編寫旨在說明英華書院的中國青年學生習得英語口語知識，同時為他們閱讀英文著作做好準備，這樣比他們在沒有任何提前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學習能更有優勢。

對於本書中僅略作提及的各類主題，我們希望學生閱讀對這些主題進行敘述的英文原著。但願這些與主題相關的寥寥數語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更順暢地理解後續所閱讀的書籍。^①

可見本書的目的意在引導學生進一步閱讀書籍，而並不僅僅限於口語會話。

1843年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往香港，19世紀5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籌辦公立學校，推行幼童教育。為了適應殖民政府教育制度上的安排，出任督學的理雅各和羅存德負責為之準備教學用書。為此，羅存德為幼童編寫了《千字文》（1856）、《麥氏三字經》（1856）、《幼學詩釋句》（出版時間不詳）、《四書俚語啟蒙》（1860）等識字教材；理雅各則編譯了《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856）（以下略為《智環啟蒙》）。^②《智環啟蒙》的原著為英國聾啞人教育家貝克（Charles Baker, 1803—1874）的系列教材之一，原名為 *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① 《英華學童便覽》卷首Advertisement，筆者翻譯。

② 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觸：『智環啓蒙塾課初步』の研究』，2002年。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該書不同於中國傳統的“三百千”，全書分為24個單元，凡200課，內容涉及19世紀西方社會的宗教、政治、經濟、生活習俗和科學知識等方面。

表2 《智環啟蒙》目次^①

	單元名稱	1856年版漢譯	1902年版漢譯	1906年版漢譯
1.	Introductory	小引	小引	小引
2.	The body and its parts	身體論	身體	身體
3.	Of food	飲食論	飲食	飲食
4.	Of clothing	服飾論	服飾	服飾
5.	Of habitations, etc.	居所論	居所	居所
6.	Of education, etc.	教學論	教育	教育
7.	The mammalia	生物哺乳類論	乳育生物	乳哺生物
8.	Of birds	飛禽論	飛禽	飛禽
9.	Of reptiles and fishes	爬蟲與魚論	昆蟲與魚	昆蟲與魚
10.	Of insects and worms	蟲類蚓類論	蟲蚓類	蟲蚓類
11.	Of plants	草木論	植物	植物
12.	Of the earth	地論	地	地
13.	Of Substances	諸物質體論	物質	物質
14.	The air and the heavens	天氣諸天論	氣與天	氣與天
15.	Of time	時節論	時令	時令
16.	Of climates	地球分域等論	地球分域	地球分域
17.	Of social life	人生會聚同居等事論	人生會聚同居等事	社會生活
18.	Of government	國政論	國政	國政
19.	Of other nations, be-sides Britain	大不列顛以外別國論	英國以外諸國	英國以外諸國
20.	Of trade and commerce	通商貿易論	通商貿易	通商貿易
21.	Of matter, motion, &c.	物質及移動等論	物質移動等事	物質移動等事
22.	Of the mechanical powers	借力匠器論	機器力	機械力
23.	Of the sight	五官論	五官	五官
24.	Attributes of God	上帝體用論	上帝體用	上帝體用

這樣，香港的學童在傳統的“三百千”以外，有了接觸英語和新知識的可能性。《智環啟蒙》邁出了獲取近代知識的第一步，可看做是東亞近代啟蒙的肇始，不僅僅是中國，對日本、韓國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智環啟蒙》在西方概念表述的詞語上的完成度不高，很多重要概念還沒有與之對應的譯詞。對這一問題，我們將在第五節討論。

① 關於1902年、1906年版的《智環啟蒙》詳後。

《智環啟蒙》之後，香港的啟蒙書編纂、出版長期無實質性進展。1877年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在上海成立，這是基督教傳教士編輯、出版教科書的機構。^①1894年益智書會出版了一種書目，向全國新式學堂和讀者推薦該會認可的圖書。該書目中以學童為讀者物件的有以下4種“讀物”（VI. Readers.）：^②

1. 《發蒙益慧錄第一》（First Reader, 1vol.）
2. 《發蒙益慧錄第二》（Second Reader, 1vol.）
3. 《發蒙益慧錄第三》（Third Reader, 1vol.）
4. 《初學階梯》（Hongkong Readers, 3vols.）

根據《益智書會書目》的說明，前兩本讀物是L. Happer小姐應益智書會的要求編寫的^③，富於教育性，採用了淺文理。《發蒙益慧錄第三》是其父Dr. Happer同樣應益智書會的要求編寫的^④，比前兩種難度大，使用的是深文理。而《初學階梯》是為香港公立學校編寫的讀本，被益智書會採納作為教科書向全國的學校推薦，以應一時之需。^⑤對這套讀本，《東西學書錄》的介紹是：

《初學階梯》三冊 香港文裕堂刻本，不著撰人名氏。亦西書塾教初學之本，取習見習聞之事物著為小論，第三論故事、論五金、論香港各篇頗足觀，中有涉教中語，可厭。^⑥

香港版的《初學階梯》筆者未見（《循環日報》《申報》上也未見廣告），而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里有一套1903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刊行的4卷本《初學階梯》^⑦，版本資訊等如下：

初集19葉，序言說這套書原來是英國的教師為義務教育學童編纂的，與幼兒教育的課本相銜接。之所以改譯成漢語，是因為與中國的發蒙書不同，西方的兒童教育注重循序漸進，由淺入深，而且內容是日常生活中的知識。作者還強調文章採用了淺文理。序言不著撰者，但另起一頁標明“光緒七年（1881）孟夏，美國夏察理福州陳修靈同校訂”。夏察理即Charles Hartwell（1825—1905），美部會傳教士，1853年4月來華，在香港停留一段時間後前往福州並一直在那裡傳教。

初集的課文由50—100字的短文構成，沒有課文序號，內容如下：

論四季 論日 論月 論星 論地 論海 論氣 論五官 論身體 論人首 論人面 論目 論身 論手 論足 論三雙及單 天下萬國 各國容貌不同 各國應以禮貌相接 上帝愛眾 國重人才 學成名顯 擇善為師 論孝宜先 論地球分界 論中國地 論日月 論小童惡謔 論孩童易於學惡 論為學當堅志勿懈 論狐得門巧 論屋 論花園 論家人 論各物所食不同 物之利用 兒竊餅餌 牧童失守 人智難及造物主 媚狐得食 兒童誇祖父壽 父老如祖樣 路問童子 問倒孔子 讀書最樂 讀書宜辨音義 讀書宜勤 讀書宜早 寫字宜端正 論物必有一音 論物必有一長 論物各有用 論天星 上帝為天之主 耶穌基督救世

二集 24葉，編排形式同初集，但內容分為以下七大類，大類下配置數篇短文。

人事類；百物類；天文地理類；譬人勿矜施惠；諺語類；格言；福音類

① 1890年益智書會機構改組，西文改為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文仍稱益智書會。

② 《益智書會書目》，上海：美華書館，第1894，第27頁。

③ Miss L. Happer是安德魯·哈巴牧師的女兒，1853年生於澳門。她曾在教會女子學校工作，1886年12月在分娩後去世。

④ Dr. Happer即格致書院創辦人及首任校長安德魯·哈巴牧師（Andrew P. Happer）。

⑤ 益智書會似乎只推薦了四卷本中的三卷，第四卷是尺牘。詳後。

⑥ 熊月之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2年，第141頁。

⑦ 本書封面鈐有John Fryer Chinese Library的圖章，不知如何流入增田涉之手。

三集44葉，編排形式同初集、二集，課文增至數百字，內容如下：

韓文公《諫迎佛骨》等古文片段8課；萬里長城等中國歷史片段3課；論基督等10課；論動物3課；論水質變化（液體三態）3課；論礦石2課；金類總論11課；論生物本性2課；論昆蟲3課；論製造2課；論亞洲1課；論香港5課（論香港開闢原始、論香港形勢、論香港歸英始末、論香港開闢原由、論香港立政治民）；論為人7課

四集71葉，卷首有夏察理《序》、陳韻清《序》、林景昌《序》三篇，時間為光緒九年（1883）農曆五六月間。夏察理在序中寫道，世人說學習與年齡一同增長，其造詣和成就則不一定完全相同。教育學童應該循序漸進，否則必然無益，所以一定要藉助（專門的）啟蒙書。以前香港的英國先生著有《幼學初階》上卷，為各處學塾採用，接著又有德國的傳教士作下卷^①，是識字的好課本。不久，英國的先生又續作《初學階梯》首集、二集、三集。首集開啟兒童學習興趣，二集增加各種知識，三集擴大兒童的眼界。我對這三本進行了“刪增校正”，合為《初學階梯》上下卷出版。但原書有“格物則有餘，以之待人仍不足”的缺點，便和福州的陳韻清先生商量，編輯了一本尺牘，稱之為《初學階梯》四集。

從首集、四集的兩個序文，我們可以對《初學階梯》的出版背景有一個大致的瞭解。即為了滿足香港公立學校的需要，英國和德國的先生編寫了《幼學初階》上下冊，然後英國的先生又續作《初學階梯》三冊。三卷本的《初學階梯》香港文裕堂有刻本行世。1881年夏察理對《初學階梯》加以修訂，1883年又加撰了四集（尺牘）。除了新增的四集以外，三集中韓愈的古文等也不似香港版原有的內容。1894年益智書會將這套四卷本的讀物推薦給全國，1903年上海美華書館加以重印。在1903年這一時間節點重印《初學階梯》反映了時代對啟蒙書的需求，也從另一個角度折射了香港以外，中國內地並沒有新式教育環境，啟蒙書編纂停滯的窘境。

19世紀60年代以後，曾有數種英語學習書刊行，但再也沒有《智環啟蒙》那樣具有新知識內容的書了。^②唯一的例外似乎是鄭其照編的《英文匯腋》初集、二集（1885）。^③該書初集序言等31頁，正文247頁，由7章（section）構成，共256課（lesson）；二集序言等15頁，正文406頁，由10章（section）構成，共213課（lesson）。鄭其照說，這套書一共使用了8,000多個英語詞，初集的生詞為3,200個，由淺入深（“淺字擇錄於前，深字選錄於後”引自卷首《凡例》，以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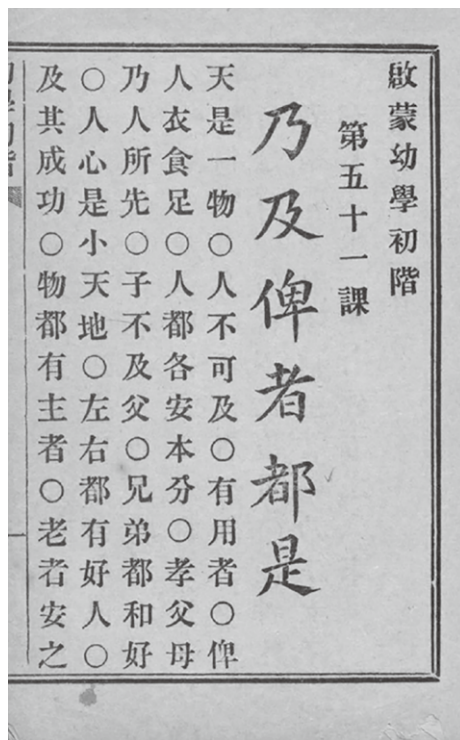


圖2 《幼學初階》下冊

① 上冊筆者未見。下冊著者似為畢安 (Rev. Charles Philippe Piton, 1835—1905)。畢氏是瑞士人，德國巴色會傳教士，1864年來華，初在香港，后在廣東客家地區傳教。（《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第387頁）。原書1874年在香港出版，筆者見到的下冊是上海美華書館1907年版。不著撰者，頁內書名為《啟蒙幼學初階》，共51—100課，每課一頁篇幅，內容為6個漢字及含有這6個字的短句。參見書影。

② 如備受讚譽的《英語集全》（唐廷樞撰，6卷，1862）只是一種詞彙加短語的集子。參見鄒振環：〈19世紀早期廣州版商賈英語讀本的編刊及其影響〉，《學術研究》，2006年第8期，第92—99頁。

③ 鄭其照《英語匯腋初集》，London: Kelly & Walsh, 1885年；《英語匯腋二集》，London: Kelly & Walsh, 1885年。

卷末附有意義分類的詞彙表。鄺其照在凡例中說，課文的漢語是“尋常各處通用語音”，即，報章上使用的淺顯的文言；人人都懂，“至文法特求淺近易學”，這樣對學習漢語的西洋人也會有幫助。鄺其照甚至說“是書平易通達，即如日本各國等人操此以習西學無不適用，皆能貫通也”。把學習英語的日本人也列入了這套叢書的讀者層。如封面的英語“designed for use school”所示，本書是為學校教學準備的。鄺其照本身參與的留學生預備教育無疑是本叢書編寫的動機之一，但是，這套書出版時，幼童出洋本身已經被叫停，國內其他學校是否有使用也不得而知。本書在美國編寫，內容上自然會有所反映。如，Section VII Duties in Various Relations（倫紀類）共18課，前15課的內容如下：

表3 《英文匯腋》初級目次

Lesson 1	Principles of family government	治家
Lesson 2	Duties of children to parents	子職
Lesson 3	Duties of young persons to their elders	敬長
Lesson 4	Duty of the pupil	學生職分
Lesson 5	Duties mutually pertaining to husband and wife	夫婦門
Lesson 6	Duty of the husband toward the wife	夫道
Lesson 7	Duty of the wife toward the husband	婦道
Lesson 8	Duty toward neighbours	睦鄰
Lesson 9	Duty toward friends	友道
Lesson 10	Rules to be observed toward employés	待工匠
Lesson 11	Means of promoting a nation's wealth, prosperity, and military power	富國強兵
Lesson 12	Duties of public officers	臣道
Lesson 13	Miscellaneous rules of courteous conduct	政教
Lesson 14	Good conduct illustrated by example	引述德政

15—18課是彼得一世和美國林肯以下三位總統的傳記。這些內容在1885年這一時段還沒有前例。

《英語匯腋》二集的目的是培養閱讀能力，共分十章，內容如下：

一、Aids to Reading; 二、Frequent Words; 三、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 四、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Acts; 五、Social Greetings and Converse; 六、Taking Meals; 七、Education and School; 八、The Home and Family Living; 九、Travel and Sight-seeing; 十、Educational and other Institutions

第二章以下包括189個常見、實用主題的對話，內容涉及更廣泛的西方社會與文化。鄺其照本人在序言中提到了《英語匯腋》第三集的編纂，但是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第三集並沒有出版。^①《智環啟蒙》《英語匯腋》二書相隔近30年，後者使用了“金字塔、電報、陸軍、上議

① 鄺振環認為三集也許是同年刊行的《應酬寶笈》。鄺振環：〈晚清西學東漸史上的鄺其照〉，《翻譯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08—246頁。《申報》1885年4月24日的廣告“新華英書已到”說“尚有《英語匯腋三集》一卷、《地球說略》一卷、《華英字典》一卷，此三書亦不日刷印，工竣出售矣。此布。”但是1893年以後的廣告中不再提《英語匯腋三集》了。可知《英語匯腋三集》和《應酬寶笈》是不同的書。三集已經準備完畢，但因某種原因沒有印行。《應酬寶笈》主要講解社交信件的书寫方法，但是也有幫助中國讀者瞭解美國日常生活、政治、經濟、宗教等的內容。例如第21課《美國總統及國會紳耆職守》、第22課《美國各省政治》等詳細介紹了總統的選舉、政黨活動、議員職責等。

院、下議院、化學”等新詞，但更多的是使用舊詞翻譯西方的新概念。第10章介紹學校專業時是

的譯詞如下：

Mathematics＝演算法；Physical Science＝格物學；Botany＝草木性；Physiology＝物性；Philosophy＝理學；Chemistry＝化學；Astronomy＝天文
文章中的一些重要概念還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譯詞，只能用詞組或短語來表達。

四、日本的近代啟蒙書

日本江戶時代，教育分為二途。武士和士子階層的子弟入蕃校、私塾，學習內容以漢文典籍為主；一般民眾的子女教育在“寺子屋”（Terakoya）接受實用型的教育，學習內容是所謂的“識字與算盤”。寺子屋使用的課本有兩類，一類是《往來物》（尺牘），另一類是《庭訓往來》。前者講授簡單的書信、商業文書的知識，後者包括歷史、道德方面的內容。這二類教材基本規定了生徒的知識範圍。教師則由下級武士、町人（含女性）擔任。江戶末期，日本全國的寺子屋超過1萬5千所。寺子屋的興盛與町人社會的成熟有關，也使日本的識字人口劇增，這在某種程度上為新式教育制度的導入做了準備。1868年日本開啟明治維新，全面推行西化，教育制度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環。1872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日本的第一部近代教育法令：《學制》，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度。設立學校需要校舍、教員以及教科書。寺子屋轉變成新式小學，原來的塾師經過培訓成為新式教員^①，而教材的準備最為費時費力，無法一蹴而就。明治初期出版了一些新式《往來物》，如《童蒙手習之文》（福澤諭吉編，1871）、《童蒙おしへ草》（福澤諭吉譯，1872）等。^②由中國舶來的《智環啟蒙》（1856）《博物新編》（1855）也起到了應急的作用。《智環啟蒙》以翻刻、和解（即翻譯）、刪節改編等多種形式刊行，除了用於英語學習外，更多的是作為小學常識課本使用。筆者曾對《智環啟蒙》在日本的流傳使用方式做過討論。^③受到《智環啟蒙》的啟發日本也開始將英語的reading book譯成日語使用。^④

1872年新學制公佈后，文部省於1873年（明治六年）組織編輯出版了一套名為《小學讀本》（しょうがくどくほん）的書籍，用於國語教育。“讀本”是江戶時代學習書的名稱，江戶後期成為小說類書籍的一種形式，因為插圖較少，所以被稱為“讀”的書。《小學讀本》最初專指國語科的教科書，後來又有《化學讀本》《博物讀本》《兵學讀本》《修身讀本》等，用來指一般的教科書。《小學讀本》是日本近代最早的官方小學教材之一，對明治時期的義務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小學讀本的編纂由文部省主導，但對編纂者、內容和出版社並無特別的限制。最初由田中義廉編、那珂通高校的四卷本（1873）；櫻原芳野、那珂通高、稻垣千穎編的五卷本（1874）；後來又有若林虎三郎編的五卷本（1884）。《小學讀本》在實際使用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例如，由於直譯英語而使句子生硬、內容過難、雜亂無系統等，因此出版后不斷地施以修訂。1886年文部省組織編修了《尋常小學讀本》（6冊），^⑤1888年推出了《高等小學讀本》。

① 日本將“normal school”譯為“師範學校”與江戶時期的傳統有關。

② 明治初期還有一些傳統《千字文》改編的“新千字文”出版，如《開化千字文》（1873）《文明千字文》（1873）《開化新千字文》（1874）《西洋千字文》（1874）《新千字文》（1874）《維新千字文》（1874）。這些採用四字一句形式的文本對漢字詞彙普及的促進作用也需要解明。

③ 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啟蒙の足跡』，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2年，第115—150頁。關於《博物新編》在日本的接受，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85—110頁。

④ 如根據Willson's Readers編譯的讀物類書，Willson's Readers還被改編為英語學習的書籍。

⑤ “尋常小學校”“高等小學校”。日本明治期至二戰前的初等教育機關的名稱。前者學制四年，屬於義務教育階段，後者二年。1907年尋常小學學制延長為六年。戰後改行六三制義務教育學制，前者稱“小學校”，後者稱“中學校”。筆者1980年曾將木山捷平的小說《尋常小學校三年之春》譯成《大倉老師》在《兒童文學》上發表。

1903年“國定教科書制度”確立，《尋常小學讀本》（第一期8冊，1903；第二期12冊，1909）獲得了國定國語教科書的地位。以下我們對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小學讀本加以討論。

（一）《小學讀本》1873年刊，田中義廉編、那珂通高校，木版印刷。

第一冊，35葉，分為7章，標為“第一回、第二回……”，無標題，每一章里有若干小話題，話題之間用“○”隔開，不使用標點。全書有大量的漢字詞，漢字標有讀音假名，書中有很多插圖。內容可分為以下三類：

道德教育：強調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愛國等倫理觀念。

常識：介紹農作物、動植物、天氣變化等基礎科學知識。

故事寓言：借鑒西方和日本傳統故事，如《烏鴉與狐狸》等。

第一、第二冊直接譯自 *The First Reader of The School and Family Series* (Willson's Readers, 1860) 的第一冊，^①從第三冊開始，課文變成較長的文章，內容也集中為一個話題。

1873年版的《小學讀本》以培養學童的閱讀、寫作能力為目的，從第一冊開始課文就是大段的文章，不具備基本文字知識的人無法使用。

（二）《尋常小學讀本》，1886年刊，6冊，那珂通世校閱、飯田直丞編輯，木刻版式，文學社出版。

第一冊，26葉，從單詞短語開始，分別舉例：名辭、動辭、副辭、居後辭（後置詞），平假名（伊呂波序）、片假名（五十音序），無漢字。

第二冊、居後辭、命令辭、代名辭、各科辭、短文。共二十八課，課文後有漢字表，使用標點：、○。

第三冊，27葉，共三十二課，簡短的文章。

第四冊，31葉，共25課，課文加長。

第五冊，32葉，24課。

第六冊，32葉，16課，課文後的詞表以漢字二字詞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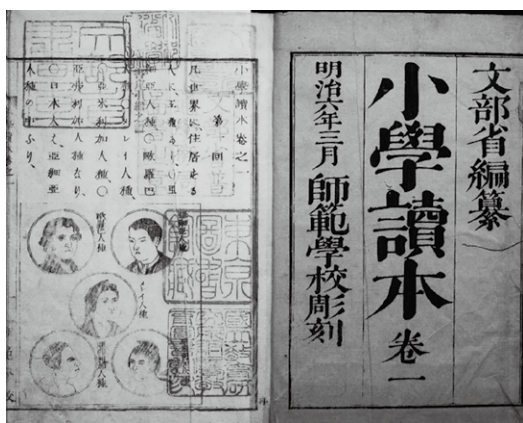


圖3 《小學讀本》（1783）卷一書影



圖4 《尋常小學讀本》（1886）卷一書影

這套書展示了近代語文教科書的雛形，體現了由淺入深的編寫原則。從語法知識入門，課文的內容也加入了更多的近代因素。但是課文仍然沒有題目，採用文言文體。

① 西本喜久子：「田中義廉編『小學讀本』卷一第一回に関する一考察——『ウイルソン・リーダー』第1読本との比較を通じて」，『広島大學大学院教育學研究科紀要』第二部，2008年第57號，第159—168頁。

(三) 國定教科書《尋常小學讀本》1903年刊，8冊，不著撰者，洋式裝幀。

第一冊，64頁，片假名、短句，不使用漢字。

第二冊，66頁，小會話，不分課，話題之間用豎線隔開。

第三冊，66頁，開始有目次，20課，課文為小文章，單詞之間有空格。但全書僅用了“日、子、大、人、木、中、土、水、字”等少數的漢字。

第四冊，76頁，20課，書眉處有重點漢字，口語體。

第五冊，80頁，23課。

第六冊，96頁，22課，文章更長，大量使用漢字，漢字用假名標音（振假名）

第七冊，92頁，23課。

第八冊，102頁，20課。

國定《尋常小學讀本》每學年2冊，從假名開始，逐漸導入漢字。課文採用採用漢字假名混淆文體：口語體和現代書面語（である形式）。為了便於學童學習，課文中的漢字旁標註假名（訓讀），降低閱讀難度。導入了目次，課文有了題目。在《小學讀本》的影響下，日本全國小學逐步推廣現代教育，幫助兒童獲得基礎讀寫能力。早期版本以基礎知識為主，但後期（尤其是1880年代以後）的讀本逐漸加入了國家主義思想，強化了忠君愛國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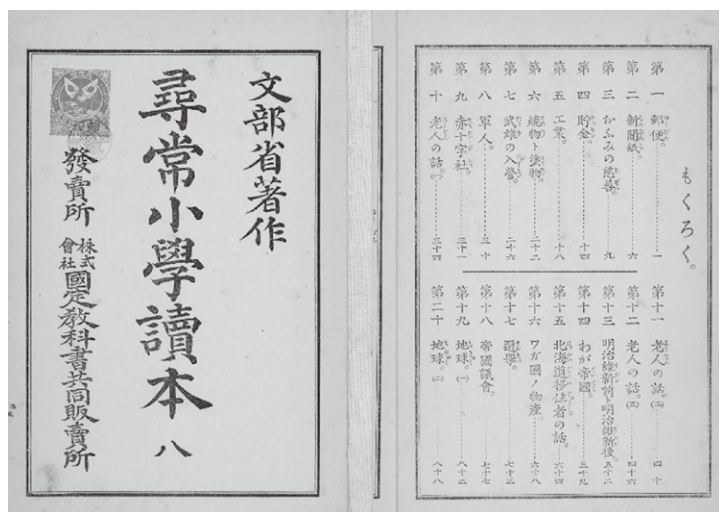


圖5 《尋常小學讀本》（1903）卷八書影

明治時期（1868—1911）日本出版了大量的名之為“讀本”的書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檢索顯示，1868—1911年期間，共有15680種書名中含有“讀本”的書籍出版（其中包括《小學讀本字引》類的詞彙集，詳後），其中將2446種做了數位化處理，可以全文檢索。新的知識就這樣以學校教育為主導，通過大量的“讀本”滲透到民眾中去了。

五、啟蒙詞彙的整備

《智環啟蒙》（1856）為漢文世界帶來了關於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的嶄新內容。但是對於那些陌生的西方概念，漢文資源還無法在詞語的層面上加以應對。也就是說既有漢文典籍乃至話語體系中還沒有能表述新知識的詞語，而這正是中日，乃至漢字文化圈同時面臨的問題。例如第154—157課的內容涉及人類社會的進化史。原著編者按照當時美國流行的文明四階段論，對國家發展的四種形態進行說明，課文原題和譯題分別如下：

表4 《智環啟蒙》關於文明階段論的表述

原文	1856年版	1902;1906年版
154課Savage Nations	國之野劣者論	野蠻諸邦
155課Barbarous Nations	國之野遊者論	未開化諸邦
156課Half-civilized Nations	國之被教化而未全者論	半開化國
157課Civilized Nations	國之被教化而頗全者論	文明諸邦

人類社會由野蠻（蒙昧）而進於未開，再到半開（半文明），最後達到文明，這種歷史發展觀第一次被介紹到漢文世界來。但是關於文明論的敘述，還沒有適當的詞語應對。Civilize以及與此概念密切相關的arts and sciences概念還無法表達；與civilized相對立的savage; barbarous也沒有特定的譯詞。原著說“The other nations of Europe, and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the most enlightened in the earth”。理雅各譯為“上數國以外，歐羅巴之別邦，及亞麥里加之合眾國，其民為天下至明達者。”^①在civilized視角下所討論的enlightened顯然不僅僅是一個識字的問題。《智環啟蒙》每一課的英語重要詞語以斜體字表述，而與之對譯的漢語常常處於短語的狀態。《智環啟蒙》介紹了“文明、野蠻”的概念，但在選用適當詞語方面沒有成功。書中出現並在漢字文化圈沿用至今的新詞只有“銀行”“陪審”“熱帶、溫帶、寒帶”等少數幾個詞。^②與本書豐富的內容相比，新詞創製上遠不能說有所成就。1902年商務印書館以《華英智環啟蒙新編》的書名出版了《智環啟蒙》的修訂版，1906年又推出《重訂華英智環啟蒙新編》。^③修訂版保持了此前版本的英語的原貌，但如表2所示，對漢語的譯詞做了較大的調整（尤其是1906年版的詞彙有較大的變更）。經初步調查，可以確認《華英智環啟蒙新編》及《重訂華英智環啟蒙新編》的譯詞主要來自《新譯英和辭典》（1902）等日本的英和辭典。日本為啟蒙詞彙的形成做出了獨自的貢獻，而作為漢字文化圈概念共同體，任何一方成員對問題的解決都將惠及其他語言。

《智環啟蒙》在香港公立學校使用，不斷再版，19世紀末還有售賣。上海的墨海書館也曾刊行過刪除英文的版本。但這本書在近代中國啟蒙中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裏有制度和語言兩方面的原因。

《智環啟蒙》出版三十年後，鄭其照的《英語匯腋》《應酬寶笈》面世。在《智環啟蒙》的基礎上，鄭其照的著作涉及了更廣泛的內容，但譯詞的創製上幾乎是停滯不前的。

啟蒙詞彙的整備需要啟蒙書與雙語詞典或術語辭典的聯動。^④從馬禮遜開始，麥都思、衛三畏、羅存德曾帶來了一個英華字典出版的高潮，盧公明的《英華翠林韻府》（1872）中收錄了二十餘種傳教士提供的術語集。但無論是英華字典的譯詞還是盧公明所收集的術語，最終其主要部分都被後來的日制譯詞所取代了。究其原因，來華傳教士之所以編輯出版了大量的英華字典，其目的是為了西方人學習漢語，雖然採用了英→華的方式，但在英語詞條選擇上，必然以漢語的某個詞英語如何說為基本出發點，西方知識體系的概念如何用漢語說成為次要問題。加之宗教上的原因和作為接受者的中國使用者沒有實際的需求，以及書籍流通上的問題，英華字典的譯

① 理雅各編《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第40頁。亦可參見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啟蒙の足跡』，第243頁。

② 關於詞語的傳播的路徑，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啟蒙の足跡』有詳細的論述，請參照。

③ 《華英智環啟蒙新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2年，第1—102頁。《重訂華英智環啟蒙新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第1—102頁。筆者使用的1902年版為架藏，1906年版是現藏於長崎大學圖書館經濟學部經濟學部分館“武藤文庫”的1913年第6版。筆者感謝楊一鳴博士惠賜寶貴資料。

④ 用於近代啟蒙性話語的詞彙可稱之為“啟蒙詞彙”，啟蒙詞彙包括大量的術語和科學敘事所需的謂詞，這是與日常使用的詞語有所區別的詞彙系統。時至今日，啟蒙詞彙已經發展成教育語境中使用的“學習詞彙”。關於“科學敘事”，參見沈國威：〈言文一致：從詞彙看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學術月刊》，2022年12號，第195—206頁；關於“學習詞彙”，參見沈國威：〈東亞共同國際詞研究——序論〉，《國際漢語教育史研究》2024年第8輯，第19—34頁。

詞並沒有引發漢語詞彙體系的劇變。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以後，西人更是直接編纂漢英字典而不是英華字典了。譯詞在羅存德以後陷於停滯狀態，盧公明和傅蘭雅在術語制定方面的努力也未能成功。中國人編纂的辭典，如鄭其照的辭典改訂增補三次，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術語方面很少有進展。其他，如譚達軒編《華英字典彙集》（1875, 1884, 1897）、梁述之編《華英字彙》（1878）、黃少瓊編《字典匯選集成》（1895）、馮鏡如編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1897, 1899）、莫文暢編《達辭》（1898），以及謝洪賚根據井上哲次郎辭典編纂的《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等辭典也都是如此。因為這些辭典基本上都取材於羅存德的《英華字典》（國人辭典名稱中的“集成”反映了這種非原創性的問題），譯詞上也就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了。謝洪賚的辭典對部分詞條附加了英語的定義（源自納爾爾辭典），但未能譯成中文。顏惠慶等在編纂《英華大辭典》時想解決定義的問題，但終於未能完成。其原因有二，一是時間緊，二是漢語還沒有做好準備。^①但是在譯詞方面，取材於《新譯英和辭典》（1902）的顏惠慶《英華大辭典》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該辭典不但收錄了大量的術語，在二字動詞、形容詞上也有所貢獻。同年譯自日本辭典的《新譯英漢辭典》《東中大辭典》《日本科學詞典》等刊行，上述辭典中的科學技術詞彙為《辭源》（1915）所接受，為漢語的現代轉型初步完成了術語上的準備。

《辭源》（1915）作為第一部具有現代性質的國語辭典，一方面收錄了大量本不屬於語文辭典收錄範圍的專業術語，另一方面，很多現代漢語中常用的二字動詞、形容詞卻沒有被收入^②，而二字詞謂詞是言文一致所必需的詞彙資源。《辭源》以後，《王雲五大辭典》（1930）、《國語辭典》（1938）相繼刊行，後者收錄了大量的口語詞彙，而對啟蒙詞彙關注仍顯不夠。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教科書《小學讀本》刊行後，坊間立刻出現了一批各學科教科書用語詞彙集：“字引”（jibiki）。“字引”是“字典”“字書”的通俗名稱，主要在口語中使用，直至明治維新（1868）實際上用作工具書名稱的並不多。但新學制實施後，各類《字引》作為教學輔助材料大行其道。如下表所示，學制實施後6年間出版各種字引有663種之多，其中《小學讀本》專用的字引達到74種。

表5 1874—1879年期間“字引”類圖書出版概況

年份	各種字引	其中《小學讀本》專用字引
1874年	14	2種
1875年	61	8種
1876年	152	28種
1877年	149	16種
1878年	148	12種
1879年	139	8種
合計	663	74種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檢索顯示，1874—1925年間（明治和大正兩個時期），字引類出版概況如圖所示，共有1904種書名中含有“字引”的圖書出版，其中1621種做了數字化處理，可以全文檢索。

① 參見沈國威：「中國語の近代性と『英華大辭典』（1908）」，《東西學術研究所成立70周年記念論文集》，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22年，第1—20頁。

② 參見沈國威：〈《辭源》（1915）與漢語的近代化〉，《中國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7—19頁。亦參見楊馳：《近代二字漢語動詞的形成與發展——基於中日語言接觸及詞彙近代化視角的考察》，博士學位論文，關西大學，2021年；周菁：《日本近代二字形容詞的形成——基於詞彙近代化視角的考察》，博士學位論文，關西大學，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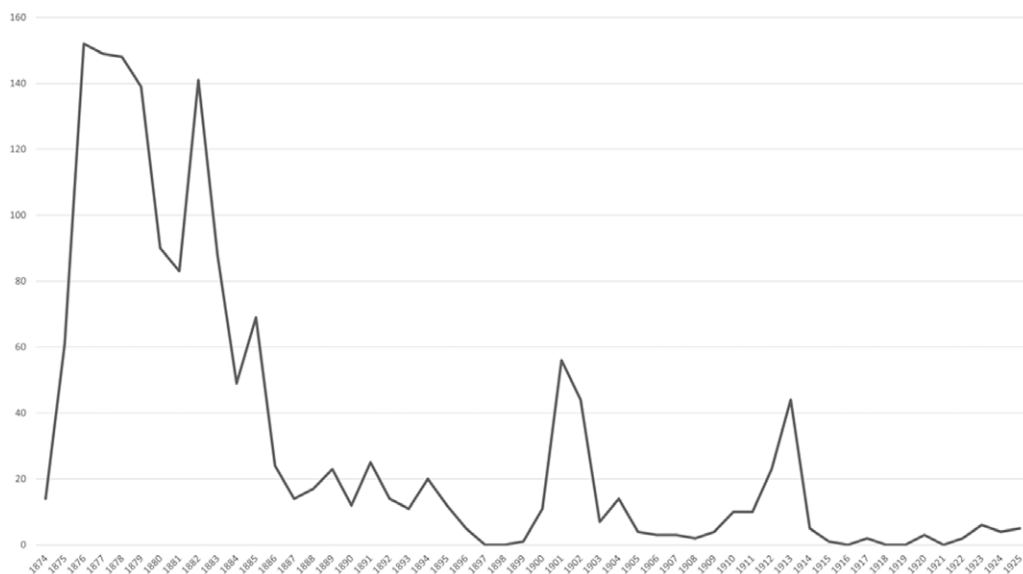


圖6 1874—1925年期間“字引”類書籍出版概況

明治前的字引寥寥可數，進入昭和時期以後，字引的出版呈現了斷崖式的下跌，字引類的“繁榮”是明治時期的特有現象。圖5中的3次高峰值都與《小學讀本》的初次頒布、重要修訂及國定教科書制度的實施有關。字引一般採用木版印刷形式，開本較小，20—60個對開頁，線裝，將《小學讀本》課文中出現的漢字、詞語（主要是漢字詞）列出來，加上音訓（發音）和義訓（詞義）。這種形式一直持續到明治末期。只有極少的字引是洋書裝幀，鉛字印刷。可以說字引是一種最簡單的生詞表。學外語的人對這種形式的生詞表都不陌生。最早出版的兩種字引：《小學讀本字引》（山本手中，1874）、《小學讀本字引》（上，卷1—3、幸田正發編，1874）的版面形式等如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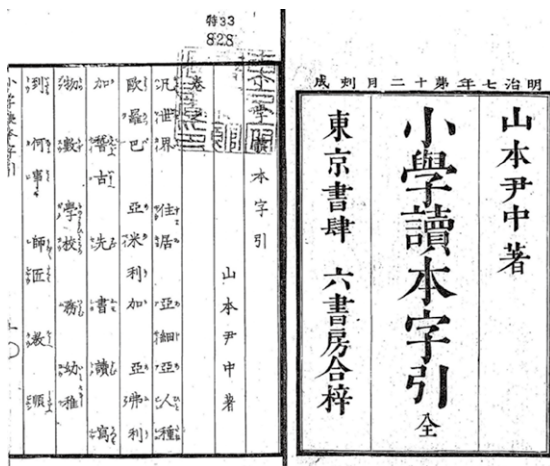


圖7 《小學讀本字引》山本尹中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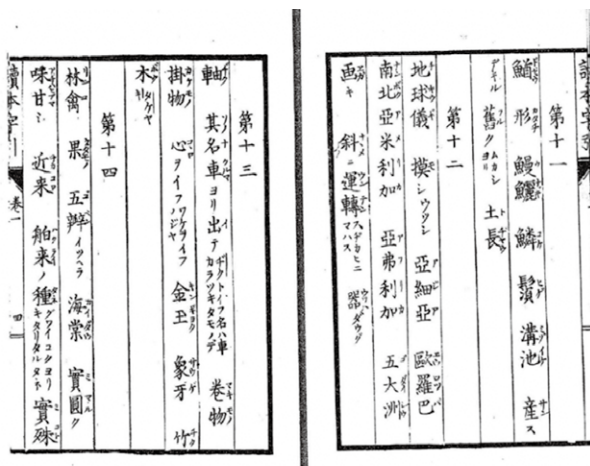


圖8 《小學讀本字引》幸田正發編

為什麼字引類的書籍會大行其道？除了學校的要求和出版社的推動等可以想像的原因以外，主要還是因為當時日本還沒有綜合性的、廣大讀者所能接受的辭典。而字引價廉，又有針對性，故大受歡迎。字引在詞語整備、統一等方面都發揮了哪些作用？江戶時代各地蕃校及寺子屋所用

教材不同，訓點方式和詞語也不盡相同，新學制實施後，也沒有統一教材。大量的字引在普及漢字知識、統一詞彙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字引並不對收錄的詞語做定義式的解釋，標準的做法是以漢字或漢字詞為單位，在漢字的兩側分別標註音讀和訓讀的假名。所謂“音讀”是漢字在日語中的古漢語模仿音，“訓讀”是漢字的日語翻譯。這樣經過訓練的日本學習者就具備了以漢字為媒介，將音和訓聯繫在一起的能力。這種能力對於創造和理解漢字新詞是必不可少的。^①大量的字引也成為日本語文辭典編纂的素材。隨著教科書的標準化，字引成了義務教育的必備教材。1891年被稱為第一部近代國語工具書的《言海》四卷出齊，其後，大型國語辭典相繼刊行。1909年尋常小學讀本第2期（因學制延長至6年，讀本也增加到12冊）頒布后，字引類的出版也隨之出現了一個小高潮。進入大正時期後，字引為各種學校用的辭典（即學習辭典）所取代，迅速消失，但是在學習過程中重視辭典的作用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

明治期的字引小巧靈活，針對性強，填補了國語辭典出版前的空白，在普及、統一啟蒙詞彙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誠然仿造、粗製濫造者有之。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的整理。

六、終章：從啟蒙詞語到啟蒙文體

1903年日本刊行的國定《尋常小學讀本》最大的功績在於相當一部分課文採用了口語體，不僅如此，還正式導入了日語現代書面語的“である”文體。“である”是判斷句的結句形式，明治時代後期到大正時代逐漸普及定型。這種文體簡潔明瞭，邏輯性強，適於表達客觀事實和進行理性表達。在現代日語中，“である”文體是一種重要的書面語形式，用於各種正式場合、學術文章、論文、法律檔、新聞報導等領域。而且正是“である”與“であります”將言和文連接在一起。如此，在“小學讀本”和“字引”合力推動下，日語在詞彙與文體方面完成了近代轉型。

中國在這一階段的情況如何？嚴復於1902年翻譯出版了《原富》，原著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原富》出版后，梁啟超立即在《新民叢報》上撰文加以推介。梁啟超對《原富》的譯詞讚賞有加，說“至其審定各種名詞，按諸古義，達諸今理，往往精當不易，後有續譯斯學之書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但是同時又對《原富》的文體提出了頗為嚴厲的批評：

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比例。況此等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②

梁啟超從啟蒙的視角詰問“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認為翻譯的目的是“播文明思想於國民”。對於梁啟超《原富》“文體太過古雅”的批評，嚴復反駁說：

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回於庸夫之聽。非不欲其喻諸人人也，勢不可耳。

① 森岡健二編著：《近代語の成立・明治期語彙編》，東京：明治書院，初版1969年，改訂版1991年。

② 梁啟超：〈介紹新著 原富〉，《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23日，第113—115頁。亦見嚴復：〈與梁啟超書二〉，王忞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6—517頁。吳汝綸在給友人的信中也對嚴復的文體表示過擔心：“如幾道之天演論，則恐‘大聲不入俚耳’”。（〈答呂秋樵〉（戊戌正月廿日），《吳汝綸全集》三，合肥：黃山書社，2002年，第181頁。

嚴復強調的是原著學理精深，而當時的漢語過於粗糙。以當時的漢語翻譯西方的書籍，無異於用中國舊之刀鋸錘鑿，製造西方的鐘錶。^①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用“漢以前的字法、句法”。^② 為此，犧牲更廣大的讀者也是沒有辦法的。^③ 話雖如此，對於文體深奧的批評，嚴復似乎頗為在意。《天演論》譯例言中就曾為自己辯解說“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④。嚴復為自己開脫，譯文的艱深是追求凸顯原著思想內容的結果。幾乎與此同時，嚴復在致張元濟的信中也數次說到他“下筆時，求淺、求顯、求明、求順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⑤ 外界評論他“於文字刻意求古，亦未盡當”^⑥。

嚴復知道將讀者限於“多讀中國古書之人”意味著什麼。他在《天演論》“導言八”的案語中寫道：

至立政之際，民智汙隆，難易尤判。如英國平稅一事，明計學者持之蓋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太深，而國民抵死不悟故也。後議者以理財啟蒙諸書，頒令鄉塾習之，至道光間，阻力遂去，而其令大行，通國蒙其利矣。^⑦

一項因“其理太深”而不被理解遭受國民抵制的政策，經過努力不懈的啟蒙，“遂阻力去”。嚴復對於在“鄉塾”進行啟蒙的重要性及效用是理解的。

進入20世紀后，中國進入了以各類學校為主體的啟蒙時代。然而，20世紀初的漢語尚不具備向學童以及廣大底層民眾講授新知識的功能，無論是在語詞——尤其是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所需要的大量術語的層面，還是在表達形式，即文體的層面，漢語都面臨著眾多的必須克服的困難。嚴復於1902年說“（應該用漢語講科學）此其說美矣，惜不察當前之事情，而發之過蚤……迨夫廿年以往，所學稍富，譯才漸多，而後可議以中文授諸科學”^⑧。數年之後又說，“今者不佞與諸公談說科學，而用本國文言，正似製鐘錶人，而用中國舊之刀鋸錘鑿，製者之苦，惟個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對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謹使用，無他術也”^⑨。新式學校的興起，對教科書提出了緊迫的要求。中國的啟蒙要同時解決內容和形式的問題。內容就是用新的知識替換舊的知識，而形式包括詞彙和文體兩個方面。同時，啟蒙還不得不在教育體制重建的背景下進行。西方分階段加以解決的問題，在中國不得不“畢其功於一役”。筆者將課堂裡講授科學內容的話語行為稱之為“科學敘事”^⑩，使“科學敘事”得以成立的要素應該有以下數種：

1. 空間：教室等學校設施，或其他公共空間
2. 媒介：教科書、教師的課堂講述
3. 內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構成現代人知識背景的常識）
4. 對象：學生，不確定的多數，其背景知識由教學大綱等規定
5. 語言形式：言文一致

① 嚴復：〈政治講義〉，王栻主編：《嚴復集》（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247頁。

② [英]赫胥黎：《天演論》，嚴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譯例言〉，第xi頁。

③ 沈國威：〈區別性與詞語密度——章太炎及嚴復的誤區〉，《亞洲與世界》，第5輯，2023年，第3—17頁。

④ [英]赫胥黎：《天演論》，嚴復譯，〈譯例言〉，第xi頁。

⑤ 嚴復：〈與張元濟書五〉，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32—534頁。據《嚴復集》編者注，此信寫於1899年11月11日。

⑥ 嚴復〈與張元濟書十四〉，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第550—551頁。此信寫於1902年舊歷正月三十。

⑦ [英]赫胥黎：《天演論》，嚴復譯，第23頁。在《原富》376—377頁的案語中嚴復對此有更詳細的說明。

⑧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1902年，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61頁。

⑨ 嚴復：〈政治講義〉1906，王栻主編：《嚴復集》（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247頁。

⑩ 沈國威：〈言文一致：從詞彙看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學習月刊》，2021年12月，第195—206頁。

如果將基於科學敘事視角的“言文一致”定義為：在制度性教育的場域對非日常性新知識的表述，其口頭形式和文章形式有著高度的一致性。那麼，此處的“言”與“文”就應該分別具有以下特點：

- | | | |
|---|---|------------------------------|
| 言 | — | (一) 超越方言的口頭語言形式：民族共通語，即國語化 |
| | — | (二) 易懂的表達形式：不用典 |
| | — | (三) 說得出、聽得懂的詞彙形式：二字詞 |
| 文 | — | (一) 應用之文而非文學之文 |
| | — | (二) 講語法：明示主語、賓語；使用邏輯詞語，如連詞等； |
| | — | (三) 新的文章形式：改行、標點、分節 |

近代啟蒙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語言形式：詞語和文體。於中國而言，前者在1915年《辭源》出版前後已經初見端倪^①，在以術語為主的詞語問題初步解決之後，文體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出來，而這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要奮力達成的目標。

（責任編輯：廖媛苑）

① 沈國威：〈《辭源》（1915）與漢語的近代化〉，《中國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4期。